

第一章 导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经国家正式识别的共有 56 个民族族群，还有其他尚待分析和进一步识别的族群（如西藏的僇人等）。我们称这个多民族国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

我们之所以称它为一个“民族大家庭”，其原因有三。一是因为这些民族群体所居住的地域东临万里海洋、北临沙漠雪原、西为世界屋脊的高原、南面是热带丛林，中国这块土地自己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生态系统，这些民族群体即是在这个地理生态系统中生长繁衍和逐步发展而成的，他们是东亚大陆上这块古老土地的共同主人。

二是在这个地理生态系统中，这些民族群体并非各自孤立发展，而是在密切的交往和不断的分化、融合的演变中形成的，其中不仅有政治、经济方面的交往，还有文化、血缘等方面的交融。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些族群消失了，其成员融入其他族群，另一些新的族群又在吸收了大量其他族群成员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

三是这些民族围绕着一个核心族群形成了具有强大向心凝聚力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体，就像一个有许多成员的大家庭。这个核心族群就是居住在这个地理生态系统的中心地带、具有悠久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在科技文化和农耕经济方面相对发达、并通过不断融合吸收其他族群而拥有庞大人口的汉族集团。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族群在这个大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可能是不同的，如在元朝和清朝时期，蒙古族和满族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就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

应当怎样来描述我们这个有几千年历史、历经变迁的“民族大家庭”及其发展规律？应当如何归纳和概括这个“民族大家庭”成员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力量把这样众多的族群如此长久地凝聚在一起？与其他多民族国家相比，我国的民族关系有什么共同性和特殊性？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始终是我国从事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工作者所考虑的问题。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多民族大国，它们通常是通过军事征服、政治兼并、经济扩张和文化融合等手段而建立，有时是通过统治者家族之间的联姻而建立起来的。这些多民族大国，如古代的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近代的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等，它们中的大多数已在内乱或对外战争中崩溃。至 20 世纪后半叶，这些多民族大国中保存下来的只有两个：苏联和中国，它们分别继承了前沙皇俄国和满清王朝的多民族政治实体^①。90 年代初期，苏联在各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下解体，也影响到部分东欧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的解体。之后，西方政界、新闻媒体和学者们，都开始把眼光投向中国，其中不少人也在期待着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解体。他们认为在前苏联解体后所出现的事态，也将会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重演。

为什么惟独这两个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大国保存下来，可能有两个因素。一是沙皇俄国和满清中国位于欧亚交界与东亚地区，其社会基础（无论是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在生产力和组织形式发展上是落后的农奴制和封建地主经济，社会主体人口缺乏进入国际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动力，也就缺乏当时西欧各国民众的那种建立民族国家的动力。二是在这两个大国面临政治解体威胁的时间，要晚于西欧各国，而且在当时有可能促使其解体的力量主要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而正在这个历史关头发生了“十月革命”和“辛亥革命”，如苏联在内战之后建立的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在与欧美的政治对抗中有效地控制住内部任何进行“民族自决”的企图。三是这两个国家都有极为辽阔的国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形成了相对独立且能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可以较少受到外部力量的干扰。

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以实现在政治、法律、文化、语言、教育、经济等方面的民族平等，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的优秀干部和各方面的人才，巩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并为各民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共同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是，在社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沿海地区与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的水平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族群文化差异在新的市场机制下民族交往加强后所引发的矛盾，这些都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摸索解决。几千年来中国发展的历史有其不同于其他国家、其他文化的特点，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解决也应该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但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之间关系的规律和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究竟是什么，仍然需要根据历史进程的事实来加以科学的说明。如果我们认为中国今后不会走上前苏联那样政治解体的道路，我们的根据是什么？这些都是我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开展深入调查研究之后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当前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面临着本国民族主义高涨所引起的政治不稳定：如加拿大面临着魁北克要求独立的问题，美国的种族冲突二百多年来始终不曾真正停止，英国已经被北爱尔兰问题困扰了半个多世纪，西班牙的巴斯克问题，法国、德国、荷兰等西欧各国的外籍工人问题，波黑的内战，非洲各国的族群冲突与屠杀，塞浦路斯的希土两族问题，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问题，中东以色列与阿拉伯人的战争，中亚各国的内战，印度的锡克族问题，斯里兰卡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的内战，澳大利亚的土著人运动，拉丁美洲各国的白人、混血儿和土著印第安人族群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不同程度的民族冲突，始终困扰着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发展。

经过历史上无数次的战争、民族迁移与通婚，加上欧美国家在

全球推行殖民主义时期以及当代的人口迁移等等社会变迁，可以说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说自己是个真正的“单一民族国家”^①。几乎每一个国家今天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种族与民族问题，而且随着近期国际人口迁移的发展趋势，民族成分的复杂化和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成为许多国家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在与其他国家民族问题的比较当中，分析我国民族问题所具有的共性与个性，分析“中华民族大家庭”及凝聚力的特点，无论在学术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应用上，在今天都具有十分特殊的重要意义。

1988年11月，费孝通教授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泰纳演讲”(Tanner Lecture)作主题发言，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演说。他结合自己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工作，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方面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做了综合性的分析，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系统性的理论。这篇演说在《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发表以后，在国内外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和高度的评价。同年，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又把费教授的这篇文章与其他学者相关的文章编成一本论文集出版，书名叫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996年10月，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举办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即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与中国的民族间关系”，这些活动反映出这一理论已经在国内外学术界得到认同并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

在“八五”期间，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名誉所长费孝通教授牵头承担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中华民族凝聚

^①关于目前世界各国人口的民族构成状况，可参见宁骚教授的详细介绍（宁骚，1995：60—75）。

力的历史与发展’^①，由我所组织了课题组。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课题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的继续和深入。它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个大框架下来进一步讨论各民族群体间交往和交融的历史条件、具体形式与内容，分析我国民族关系中仍然存在的现实问题，研究各民族协调发展与共同繁荣的途径。在当今世界各地民族主义普遍高涨、民族冲突不断激化的情况下，这一研究所总结出来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理论和经验，不但对我国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具有直接的应用性，也可供其他国家借鉴，而且因为它研究分析了世界发展中具有普遍性的重大社会问题，也可以推动国际学术界对于民族和民族关系的比较研究。

本书即是这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研究成果的组成部分，反映了课题组成员在这一课题所涉及的主要领域的思考。由于我们的思考仍然以费孝通教授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基础，所以在这篇“导言”的第一部分中，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这一理论的梗概；费孝通教授在他的文章中谈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层次”，我们认为这是理解这一民族格局的关键，所以在第二部分对此进行讨论；第三部分进一步讨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历史进程的三个大阶段；第四部分着重分析自建国以来重建、巩固这一民族统一体所面临的新的历史条件；第五部分结合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讨论各民族如何达到政治上维护统一、经济上共同繁荣；第六部分介绍本书的整体结构和各章的研究专题。最后，在“导

^① 也有学者认为“向心力”不能全面而确切地表述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历史的内涵，“凝聚力”中的“凝”字不能确切地表述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动态，因而主张使用“聚合力”（陈连开，1994：275～276）。“凝聚”两个字放在一起，似仍可表述动态过程，且“凝聚力”一词已广泛应用，所以我们在这里继续沿用。哪一个词汇表述更为确切，今后仍可讨论。另外，有一些学者在使用“中华民族凝聚力”概念时，主要应用于海外华人与祖国之间在血统和文化方面的血肉联系，这一用法与本文使用的定义有所不同，只要在学术用语的应用上，只要各自在具体应用时定义明确，应当允许有不同的理解。

言’的第七部分里提出了今后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凝聚力特征开展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费孝通教授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费孝通教授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篇文章中，依次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来阐述他的主要思路与观点：

1. 东亚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而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费孝通，1989:2）。这个观点从地理生态系统的角度，说明通过共同生存的土地，在中华民族各族群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

2. 中华民族各族群起源的多元论和本土说。各族群起源的多元说明我国几千年来延续至今的民族‘多元’现象有它的历史渊源与根基，也说明今后我国民族结构中“多元”现象的历史长期性。

3. 考古发现表明，自新石器文化时代开始了中国各地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渗透“，从多元之上增加了一体的格局”（费孝通，1989:3）。这种交流与渗透至今已有超过五千年的历史，在文化方面形成了中华各族群之间各种外在的或潜在的共性，构成了“一体”格局的深厚的文化基础。

4 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是汉族前身华夏这个民族集团从多元形成一体的历史过程。……汉作为一个族名是汉代和其后中原的人和四围外族人接触中产生的，……当时中原原有的居民在外来的人看来是一种‘族类’而以同一名称来相呼，说明了这时候

汉人已经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民族实体”^①。“汉族的形成，……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费孝通，1989：4～5）。

对汉族的深入分析，是理解我国民族关系和“多元一体”格局的关键。费孝通教授这段话有三层意思值得注意：（1）首先他把汉人的前身“华夏”称为一个“民族集团”而不是一个民族，因为它实质上确是一个“集团”^②；（2）这个集团的形成经历了“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过程；（3）由于它发展为“一体”之后被其他族群称为“一个族群”称之为“汉人”所以“汉人”也成了这一集团的自称并自认为是“一个族群”。在这种“他称”转“自称”的过程中很容易混淆各族群的实质和不同族群之间的层次。

5. 中华民族各族群统一成为政治实体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中原农业区和北方草原游牧区分别形成了两个并立的统一体，第二个时期是这两大区域统一体的汇合。万里长城一度是两个区域之间的屏障，同时在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人口诸方面的密切往来。在清朝最后实现了完全的统一。

6.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相互融合的历史，唐、五代、宋、元、明、清都是如此。北方、南方各族群不断向汉族输入新的血液，部分汉族人口也融入了边疆各族群。

费孝通教授十分生动形象地归纳了这个民族融合的过程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特点：“（这一形成过程）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接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

^① “据现有资料，汉人作为民族名称确定无疑的是在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期”（王锺翰，1994：156）。

^② “早期的华夏族是包括了一部分羌人、夷人、戎人、狄人、苗人、蛮人在内共同融合而成的。传说的夷人中较早融入华夏之内的就有四支……”（陈永龄，1982：250）。“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通过战争和经济文化交往，与羌人、夷人、戎人、狄人、苗人、蛮人互相融合，奠定了后来华夏族的基础”（王锺翰，1994：6）。

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疆域内部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形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费孝通，1989:1）。

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费孝通教授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精辟地总结了六个特点：（1）这个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凝聚的核心，就是华夏族团和后来的汉族，汉人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2）相当部分的少数民族从事畜牧业，汉族以农业为主，形成内容不同但相互补充的经济类型；（3）“汉语已逐渐成为共同的通用语言”；（4）汉族的农业经济是形成汉族凝聚力的主要来源；（5）各民族之间在人口规模上大小悬殊；（6）中华民族成为“一体”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先有各地区的“初级的统一体”，又形成北牧、南农两大统一体，最后以汉族为核心汇成一个“大一统”的格局。最后“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费孝通，1989:16~18）。

费孝通教授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分析我国的民族关系史方面，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不拘泥于个别史实的考证，而是试图抓住几个基本脉络，探讨中国多民族国家实体的形成过程，有一种开创性的、全新的视角，在对中国各民族交融发展的实际进程的分析中提出了一些新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思路。可以说，这篇文章实际上勾画出了中华民族这个民族集团形成、发展历史的基本轨迹。

我们读中国历史，读中国各民族的历史，读中国的民族关系

史 费孝通教授的“多元一体”思路可以作为一条主线 对我们理解这些纷杂的历史事件有重要的启发。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在接触国外的民族理论时，把中国的民族形成过程与国外的民族形成过程相比较，在事实的对比当中来比较各自应用的“民族”概念和相关理论。这样既可以避免盲目照搬；又可以实事求是地理解各国的民族发展史和相应的理论。

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体的多层次性

在一个多民族的政治统一体的内部结构中，各个族群的位置是否都居于同一层次？各个族群所扮演的角色是否相同？在这个统一体中发挥的作用是否相似？当我们在分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时，会很自然地提出这些问题。

1997 年费教授在另一篇文章《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中，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主要论点进一步概括为：(1)“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 56 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 56 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56 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个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个论点我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2)“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3)“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以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

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费孝通,1997:10)。

费教授这段话中的核心,即是“多元一体格局”内部各族群之间存在着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性。当然,存在决定意识,这个高层次“共同的民族认同意识”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各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分布诸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实体。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性反映的是我国民族结构的多层次性。

1. 如何看待‘民族’群体 民族集团是否分层次

当我们谈“民族”的时候,是不是对于所有的族群都应当只使用一个概念、定义?同样以“民族”来相称的族群是否都具有完全相同的内涵?换言之,在分析多民族群体时对于这些族群分不分层次?国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所提出的不同意见,主要认为中国每个族群(汉族、蒙古族等)各自就是一个民族,“中华民族”的提法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对于民族的学术研究没有意义。他们认为中国存在着几十个民族,但不存在一个“中华民族”,只有“多元”而没有“一体”。这是国外一些民族学、人类学者所持的观点。

无论是国内或国外的任何民族群体的形成,都有一个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不是在某一天里,一个民族就可以突发式地形成。在一个民族群体形成的过程中,往往是许多部落在一定的条件下(如外敌入侵、物资交换、首领通婚等等)聚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族群。在各国历史文献中,均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记载。这些聚合在一起、使用一个统一族群名称的各个部落群体(亚群体)会由于其群体人口规模和进入这一族群的时间长短,在一个时期内并在不同的程度上保持自己的语言、习俗甚至社会组织形式。应当说,这种与族群认同程度不同的现象就表明了在一个大的民族群体中,各“亚群体”居于不同的层次。如果这个大族群能够稳定地存在一个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这些“较低层次”的亚群体的文化、社会特征就有可能逐步淡化甚至消失。在实际生活当中,可能存在着

两个、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层次^①。在研究中如何具体划分，则取决于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形，取决于研究的具体目的和相应的分析方法。

人类社会十分复杂，我们使用的概念（如“民族”）^②应当是对于复杂的社会现实的归纳和概括，而不能用外在的抽象、简单的概念去人为地定义一个社会。所以在研究民族时，从事实出发，应当承认在民族族群中存在着“层次”同时“层次”的结构随着时间推移有可能发生变化，积累起来的量变可能导致质变。这是辩证地看问题，而不是形而上学、僵死地看问题。有了这样一个思维方法，在看待“中华民族”整体与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时，就可以思考和分析这里是否有一个族群体的“层次”问题。费孝通教授提出，我国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费孝通，1989：1）。“在现在所承认的五十多个民族中，很多本身还各自包含更低一层次的‘民族集团’。所以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费孝通，1989：18）。这些只要不带着抽象概念的框框，而是去仔细观察周围活生生的现实，都是不难观察到的。而我们对于社会或“民族”现象的认识，就是应当从对这些活生生的现象的理解和分析当中，逐步总结和提高。

对于“层次”的理解，也还有一个“名”“实”之分。一些统一了中国的少数族群，在当时中原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但实

如藏族中又可分为卫藏、安多、康三大方言群体，每个群体还可进一步细分下去；彝族内部还有诺苏、纳苏、罗武等不同自称的亚群体。

^① 关于“民族”一词的定义及翻译，请参看本书第二章。

质上很快即成为中原文化的代表与推行者^①。虽然这些非汉族建立的新王朝也会在中原文化上打上自己的文化烙印，但是深入地看，中原文化始终是“实”而皇帝来自哪个族群，最终仅仅是“名”。

中国几千年的“改朝换代”，从来没有真正危及中原文化的延续与发展。那些抵制新朝的“遗老遗少”，一些人是为了报答旧朝皇族的恩，大多数是出于对中原文化遭破坏的担心。而开国的新皇朝，不论是来自哪一个族群，为了得到庞大中原人口及其精英分子的支持，也要拼命表示自己继承了前朝的“皇统”，将要全力去保护与发展中原文化。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要按照历朝传统的格式，为前朝修史，完成这件“改朝换代”的程序。所以蒙古族的元朝朝廷要主持撰修《宋史》，满族的清朝要修《明史》。反过来，汉族的宋朝要修《五代史》，明朝要修《元史》。这是很有中国特色。从文化角度看是“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是皇帝家族的族籍和姓氏的更替，而不是文化和法统的更替。这十分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帝国或王国的覆灭。

2. “汉族”的核心是“汉文化”

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需要理解“多元”与“一体”之间的关系，而要了解中国之所以能长期稳定保持“一体”，而且在欧洲人入侵的鸦片战争之前仍能不断扩展，就必须分析能够把许许多多族群凝聚在一起的核心族群，这就是“汉族”。我们现在天天使用“汉族”这个词汇，但是它的来源和真实的含义是什么？

“民族的得名必须先有民族实体的存在，并不是得了名才成为

在少数民族统治汉族地区的时代，这些族群无例外地均被汉族文化所同化，其主要原因，一是汉族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和生产组织，“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1972:70）；二是汉族拥有庞大的人口，如果不去适应汉族文化而是去强迫汉族全盘接收异族文化，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就无法统治和生存。

一个民族实体的”。名称不过是对现有事物给予的一个标签，就像先诞生了孩子，再给孩子取名字一样。“民族名称的一般规律是从‘他称’转为‘自称’。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费孝通，1989:5）。民族意识是民族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专题，与民族名称密切相联。费孝通教授在这篇文章中认为“汉族这个名称不能早于汉代，但其形成则必须早于汉代。……汉人成为族称起始于南北朝初期，可能是符合事实的”（费孝通，1989:5）。在汉朝之后的南北朝，人们开始采用“汉人”这一名称来称呼中原地区从秦汉因袭下来的农耕族群。

在历史上，北方各民族（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西夏、满族）多次大规模进入中原农业地区，其结果是不断地为汉族输入了新的血液。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曾采取强制手段对属民进行“汉化”，要求“胡人改汉姓”。同时汉族农耕地区也不断向南扩展，逐步把南方土著居民（东夷、吴、越、楚的后裔）中很大一部分吸收进汉族^①。这样汉族就成为一个以农耕文化为主体、不断融合其他族群而形成的一个十分特殊的民族集团，到今天汉族人口规模达到 11 亿，是全世界最大的族群。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汉族与我国其他民族并不处在同一个层次上的。在基因和体质方面进行比较，北方汉族与蒙古族更为接近，而与南方汉族距离较大。所以构成“汉族”的最重要的基础，不是体质特征和血源基因的同源，而是文化层面的同化。广东人是汉族，但是广东人的体质特征与越南人相接近，而与北方汉人差别很大，广东话发音与汉语普通话的差别也很大。中

林惠祥把汉族的主要来源归纳为华夏、东夷、荆吴、百越四个系统（林惠祥，1939）

原王朝在区分属民时,常用的范畴是“化内”和“化外”。所谓“化”在这里指的是汉文化的“教化”。凡是接受“教化”的就被认同是“天子”的臣民。“化外之民”则是需要教育开化的生番、“蛮夷之属”。中原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认为“化内”和“化外”可以相互转换,“有教无类”,所以古人也懂得辩证法。这里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宽容态度和自身极强的包容力。从儒家、道教、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各类民间宗教(崇信关公、土地、城隍、妈祖及各行业的保护神)都可以在中华文化圈内和平共处,即体现出了中华文化(汉文化)的包容力。

汉族的这种“文化取向”即以“文化”内涵来确定族群“认同”的观念,也不可避免地给“中华民族”各个族群以及当权皇朝的意识形态与政策目标打下烙印。艾森斯塔得称中华帝国是“文化性取向”的官僚体制国家^①;这种文化取向,导致了对政治—集体性目标——如领土扩张、军事强盛和经济增长相对较少的重视”(艾森斯塔得,1992:5~6),而对各族群之间的文化融合和矛盾协调则十分看重。

在与国内其他民族的交往中,汉族的民族意识比起其他民族来要淡漠得多,这在族际通婚、申报民族成分、日常交往等方面都能反映出来。所以这样一个以文化为基础的,在“教化”中积极吸收其他族群的、具有极大包容力的“汉族”也许不应当被看作是与其他民族属于同一层次的族群。与我国其他民族群体相比,汉民族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以文化层面为核心(这一汉文化又以几千年相对发达的农耕经济为基础)的高一个层次的族群集团。为了更

他把历史上的官僚体制国家政权的政治取向分为四大类:(1)“文化性的”,(2)“政治性的”,(3)“政治—集体性的”,(4)“经济—社会性的”。中国属于第一类,“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认定,文化和伦理的规范包含了有关正当的政治行为和政策的所有教条”(艾森斯塔得,1992:237)。

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关于汉民族发展演变的研究应具有特殊的意义。

当然，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过程（被迫或自愿）中，一些汉族民众也不可避免地被融合于其他民族。在各个地区，其他各个民族之间也存在着相互融合的过程。通婚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费教授说：“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费孝通，1989：11）。

在中国的史书上，极少在族群集团的名称上直接使用“某某族”的提法，通常是称“汉人”、“蒙古人”、“藏人”、“苗人”等等。而“族”则多用于异文化群体的泛指，如“异族”、“非我族类”等提法。对我国的族群直接使用“某某族”的称呼，主要是近代以来受西方和日本文化的影响。我国历史上的族称为什么不是这样称“某某族”？也许反映出我国传统上在“中华神州”范围内的族群划分中，对于“文化（教化）的重视和对于族源血统的相对轻视，因为这里的“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来划分的，体现出了汉文化“有教无类”的极大包容性，同时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汉族在与国内少数民族接触中自身的“民族意识”非常淡漠，而当他们在与欧美人接触时，在他们心中被唤起的是强烈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①。这种民族意识的层次感十分清楚地反映在汉人的意识和态度中。关于中文里“民族”一词的定义以及民族意识的产生与延续等问题，我们在本书的第二章中将做较为详细的讨论。

3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形式上主要体现在对于中原地区和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出现了汉族集团这个凝聚核心之后，它的凝聚作用是如何发

例如在国外学习的汉族留学生与我国各少数民族留学生之间有着同属“中国人”的高度认同感。

挥出来的？

首先，几千年以来，中原地区始终是汉族人口的集中聚居地，是东亚大陆农耕经济的中心地带，也是手工业和贸易的核心地区，在此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都市，也随之成为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中心，换言之，中原地区是整个华夏文明、汉文化的中心。所以四周各族群都以中原地区的文明作为仿效的典范，积极接受和学习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争取中央朝廷的赐封和爵禄，各族首领最大的野心就是“入主中原”。一旦侥幸成功就千方百计地使自己被中原百姓接受为继承华夏文化的“正统”王朝。这种心态，也说明了他们在内心里对汉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原地区的向心力。有的学者认为，正是汉族的“这种较高文明作为民族凝聚力和稳定性的基础”（陈永龄，1989:12）。

其次，中原地区精耕细作的农耕经济十分繁荣与发达，周边少数民族从事的或者是草原畜牧业，或者是山区狩猎、采集和粗放农业，生产规模小而且产品品种相对单一。这样，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和物资交换就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不可缺少的补充。如中原农区与北部西部牧区之间的“马绢互市”和“茶马贸易”一度是中央王朝控制游牧民族的手段。汉族农业地区成为东亚大陆的经济中心，从而对周边地区的族群产生吸引力，从少数民族的角度说就是“向心力”。这种“向心”的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并使一些少数民族也接受汉族的农耕文化之后，这些族群就逐渐地被融入了汉族，如历史上北方的契丹人和女真人，近代的部分蒙古人和满人，以及居住在南方的越人、楚人等。费孝通教授曾说，“如果要寻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费孝通，1989:17）。发达先进的农业，是中原地区对周边族群具有凝聚力的经济基础。

最后，在几千年人口迁移的过程中，汉族能工巧匠凭借其在农

业、手工业、建筑、医学、水利等各方面的先进技艺，汉族商人凭借中原地区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商业网络，大量迁移并定居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和乡村^①。“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和商业据点一般都有汉人长期定居。这样汉人就大量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费孝通，1989：16）。正是这样一个网络，把中华民族各族群、各地区与中原地区和中央政府密切地联系起来，形成了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人口基础。而这个网络的核心部分，就是中原地区和中央政府。

综上所述，从中国几千年发展历史来看，中华民族族群内部的凝聚力，还不是简单地以同样的强度平行地存在于各个族群之间，而主要体现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对于中原地区和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三、历史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三个阶段

当我们基本认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作为理解我国民族关系特点的一个理论框架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析其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可以大致地把这个基本格局在整个历史上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1 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时期

根据考古的发现，可以说明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大地上，在远古

^① “民族迁移和流动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以至于融合、同化，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形成，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在血缘上的融合和形成，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一个重要历史途径”（陈育宁，1994：12）。“民族迁移是凝聚力发展的催化剂”（陈育宁，1994：219）。